

思想



张彦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拥有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对美国的经济安全有多重要?这倒是一个我从没说想过的问题。但是前不久我在国家会计学院讲演时,一位听众向我提了一个关于“经济安全”的问题。他在提问中说到,每个国家都会考虑经济的安全,美国就是一个特别注重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国家。我问他,何以见得?他回答说,美国的波音公司之所以不愿意与中国的飞机工业合作或者合资,就是出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战略考虑。

类似的判断似乎最能迎合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不能肯定这样的判断是否属实。也许他的判断是对的,但即便这样,我们还是要把政府与企业的战略差异,波音公司并不是美国政府的“国有企业”,是否与中国合资以及合资生产哪些东西,都是企业自身的决定,应该不需要获得华盛顿的同意。20年前,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不就积极地与上海合作制造过飞机吗?无疑,白宫今天对高端技术向中国的出口确有一定的限制,但这是

求索

央企红利与“最后通牒博弈”

国资委最近发布的一份关于央企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显示,上半年央企利润同比增长了16%,超过7000亿,雄踞整个中国GDP总量的4%。眼前,这块庞大的超级蛋糕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当然,关注的不仅仅是它究竟有多大,而是我们一时无法给出一个最为合理的分割方案。

在原有的社会经济体制下,直接控制着这些利润资源的央企自然会顺理成章地拿下这一超级蛋糕的剩余索取权,把原先需要上缴给国家的利润留存垄断企业内部。不管他们以何种形式、如何消化这些利润,但这些都到现在的都不知道究竟归属于谁的红利已的的确确养肥了这些垄断行业的爷们。按照现在网上抖搂出来的一个极端例子,在“电老虎”行业的一个普通抄表工年薪也有10万。可想而知,其他大虾们的红利会有多大。尽管已多人出面辩解此说非真矣,但这些央企的高福利待遇早已是众人皆知的“默会知识”。

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总是宣称垄断行为扭曲了经济效率,破坏社会福利水平,但奇怪的是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现今的积极性和去反对垄断行业的高工资呢?原因很简单,就如心理学大师马斯洛所说的那样,人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需求,社会大众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也

大局



周兴维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曾写出惊世骇俗《莎菲女士日记》的丁玲,1957年百花齐放时,因为放了一下,被打成右派。1979年平反后,丁玲却把她打成右派的领导韦广禄非但没有微辞,反而主动、积极地为她辩护,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丁玲对与她同样遭受迫害的人不但没有同情,反而言辞激进,比那个左派领导还要左。

有人就说:丁玲一定是被逼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她真就是这种感觉,这么认为的。

郭沫若在“十年动乱”期间出过一本《李白与杜甫》。这本郭老一生最后的文学评论专著,结果是毁

怎么才算国家富强?

政治上的问题,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于是我把问题变成了“怎么才算国家富强?”毕竟,富裕了才更多考虑安全。

那么,怎么才算国家的富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遏制别国的经济发展而变得富强吗?阻止向中国出售所谓高端技术产品就可以让阻止者继续维持高端技术的领导地位吗?在大洋彼岸,这样的思维方式只有那些标准的政客才会有。这是政治思维而非经济思维。我相信,即使把经济学家放在一边,企业家也不会这么思考问题,真正目光远大的人同样不会这么想和这么做。

在中国这边,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念念不忘一个实现富强的梦。至少从“鸦片战争”以来,这个梦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实现“富国强兵”。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时间里,“富国强兵”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经济的政治化取代了经济的自由化。虽然国家的富裕和强大这个大目标的确激动人心,鼓舞人心,可是国家的富裕又是什么含义呢?在当时政治化的思维方式下,国家的富裕就是国家要拥有强大的工业。而要拥有强大的工业,国家就要拥有完成工业化道路的全面的资源和动员这些资源的绝对的权力。但推行了几

十年的国家工业化,打开了国门之后人们却发现国家并没有变得更富裕和强盛,反而跟那些强国的距离还在拉大,可是人民为国家却做出了太大的牺牲。

今天,我们依然做着富国强兵的梦。尽管还有种种不如意,还有东西南北间令人难堪的差距,但中国人的确变得比30年前富裕多了,国家也强大多了,事实就是如此,国家拥有的产业和资源大不如从前了,国家拥有的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大下降了,国家也比过去更加对外开放,更加依赖了外国的企业和技术,而更多的中国人却走向了富裕。几十年来经济学的研究让经济学家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但这个道理对于稍微变得富裕的今天的中国人来讲仍然不容易被接受。

在当今的公共话语里,“我们”这个词很快地又被放在了其他事情之前,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我们要变成富强的国家,政府就应该做得更多,就应该拥有更多的重要产业。为了富强,我们必须得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必须自己控制着战略性的产业,而不是让那些在我们本土不断渗透的外资去控制。这是当下在中国正流行着的“经济爱国主义”的核心观点。这个观点虽然十分动听,深

得人心,但似乎并不那么真实。我试着顺着这个思路再深一步追问下去:“我们”是谁?是指中国的政府机关(它代表国家和人民),还是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如果是后者,那么,什么样的企业才算是“我们”的而不是别人的?必须是中国人自己的企业吗?必须是中国人当老板的企业吗?或者必须是中国控股的企业吗?

我们的确要思考很多问题来理清一些并不复杂的道理。富强的国家到底拥有了什么才达到了富强的?是谁在拥有什么?是“我们”还是“他们”?是技术?是企业或企业家?是政府的财产?必须是在美国国土上的公司才是美国富强的标志吗?是更多的美国人自己拥有公司才是美国富强的标志吗?波音公司和硅谷撤离美国搬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会显著影响了美国的富强和经济实力吗?

在我看来,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富强的国家既难以用政府的财富或者规模来度量,也难以用政府拥有的产业和资源来标志,更难以用是否很多产业被外国人拥有或者搁在外国来判断。思前想后,在这个开放和全球化的世界上,标尺应该只有一个:只有国民拥有了创造财富的自由,国家才真正会是富强的。



陈舒中

经济学博士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附近;而对参与者B而言,如果其分配的数额不少于三分之一,他将趋向于接受”。

利益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普世原则,每个人都有谋求利益的动机和合理诉求,但这种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必须置于不伤害别人利益的前提。遗憾的是,现实中的产权边界往往是模糊的。套用产权学派代表人物巴泽尔的话,社会发展存在着很多的“共同领域”,而我们现在遇到的“央企红利”就是一个典型的共同领域问题。对于这一社会全民所有的利润来说,人人都有权去享用这些财富。关键是,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方案既能使处于强势的利益群体不失望,也使处于相对弱势的利益群体得到尽可能的满意呢?“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结果告诉我们,如果无法尽可能地满足这一标准,最后的结局不是各自得到多少,而是“玉石俱焚”,谁也得不到利益,从而扼杀整个社会发展的经济激励。这对中国接下去的转型改革来说,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我们应该从“央企红利”这一切入点开始,认真对待随之而来的一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我们应从“央企红利”这一切入点开始,认真对待随之而来的一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国际油市可能存在稳定的高油价均衡和低价均衡 蒋玉磊制图

管窥一得

神机妙算克鲁格曼



管清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博士生

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是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很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大学的经济系学生想必大多都读过他和茅瑞斯·奥伯斯特法尔德(Maurice Obstfeld)合著的《国际经济学》。2000年,克鲁格曼给《纽约时报》写过一篇专栏文章“The Energy Crisis Revisited”(能源危机重现)。与他前一次预言亚洲金融危机到来的文章一样,他这篇预言新一轮国际油价上涨的文章起初并没有引起重视。不过,从2000年到2006年,国际油价的走势恰恰证实了克鲁格曼的预言。能这样准确地预测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的经济学家,全世界恐怕也是屈指可数。

其实克鲁格曼的分析逻辑很简单。他认为,石油是可耗竭性资源,其石油生产受到政府控制,对于主要石油输出国来说,石油是国民收入和政府收入的支柱。因此,由于短期石油需求缺乏弹性,国际石油市场可能存在着稳定的高油价均衡和低价均衡。

具体来说,石油出口国的石油收入除消费外主要是为满足其投资需要。由于国内投资资金吸收能力的制约,投资的边际收益往往递减至难以接受的水平,投资到国外除受到收益率制约之外,还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因此石油出口国必须在投资和收入之间权衡。当油价处于低位时,主要石油输出国为达到一定收入目标将不得不扩大生产和出口,从而形成稳定的(长期)低价均衡。当因市场冲击而带来高油价时,由于石油需求缺乏弹性,扩大产出甚至可能会减少收入,因而石油输出国通常不会扩大生产,相反,由于主要石油输出国内投资的容量有限,石油仍会保存在地下也是一种“投资”,所以油价高企时他们反而会减少产量,以求形成稳定的(长期)高油价均衡。1986年国际油价的历史低点就导致了国际油价从低价均衡走向了高油价均衡。石油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单个产油国的

供给曲线加总就可以得到世界石油市场的供给曲线。这样,当市场冲击带来需求曲线移动时,需求曲线可能会同供给曲线相交于不同的位置,形成两个均衡点;一个均衡点代表的是较低油价和较高石油供给量,另一个是较高油价和较低的石油供给量。正是从这样的曲线变化中,克鲁格曼判断,新一轮油价上涨即将到来。

克鲁格曼的思想来源和分析模型都来自他人。其假设前提实际上承袭了霍特林(Hotelling)1931年可耗竭资源模型的思想。看看霍特林的分析模型,你会发现,克鲁格曼的分析逻辑和霍特林的分析逻辑几乎完全一样,其所使用的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来自正统的经济学教科书,其多重均衡模型的构建来自两位经济学家——杰奎斯·克萊默(Jacques Cremer)和德贾瓦德·沙雷西-伊斯法哈里(Djavad Salehi-Isfahani),他们证明了竞争性均衡来自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

有意思的是,虽然霍特林的开山之作,但直到1974年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引用这篇文章之后才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杰奎斯·克萊默和德贾瓦德·沙雷西-伊斯法哈里则是执教于弗吉尼亚技术学院以及州立大学两位普通教授。他们当然不如克鲁格曼有名气。不过,有一套书叫《理论和应用经济学基本读物》,据说美国大学经济系学生必备的经济学百科全书。这套读物包括了经济学的整个领域,每一册书都是某一特定领域的前沿介绍。杰奎斯·克萊默和德贾瓦德·沙雷西-伊斯法哈里写了其中一册——《石油市场模型》。克鲁格曼当然提到了他们的文章和见解。

别人画了龙,克鲁格曼点了睛,而且点的很是时候。很多经济学家都预言过能源危机,但没有像克鲁格曼这样正好在油价波动的拐点上作出预测。克鲁格曼很自豪,在这篇专栏文章的最后,他还煞有介事的“显摆”了一下,说自己能源危机模型其实还是来自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模型,并把两张相似的多重均衡模型图贴在了文章后面。看来克鲁格曼不光是感觉好,似乎上天也很眷顾他。要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有时候也需要点运气。

生出来的一种无悔论和母子论——正是在这种天子父母官文化的历史必然性名义下,一次次忤逆人性的迫害大屠杀大清洗,一桩桩骇人听闻的罪行和暴力,一幕幕肮脏阴暗的交易和欺骗,一场场流血的与电火的洗礼,一出出倒行逆施的指鹿为马和黑色闹剧,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周而复始,从而,一天天病人膏肓的冷漠和麻木,最终使方正道德和良知价值在国人心中根本地丧失了地位。

如今,公开的普遍的红色恐怖消褪了,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之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公开的制造者以及普遍的患者也不多了,但这病症并不那么好医治。一则因为此症的隐蔽制造者和局部患者还不少,二则因为心道的传统还在;且两者又都往往处在关键位置,故极易导致局中人反复的创伤,反复的患病,如此一代一代又一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很难康复。

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有这个意思。

杂拌儿

李鬼多了
李逵贬值

张晓晖

中银国际证券金融分析师
现居天津

古时候,人们看农历节气来安排农活,惊蛰芒种立秋;过日子讲究一点的看日暮,比如皇帝、官吏,老百姓凑合着看日头,或者按照“一顿饭的功夫”、“一袋烟的功夫”算时候。但说来说去,毕竟还是有个标准,如果太阳运行不规则,那就糟了,标准没有了。

3.15栽在一块“地板”上,消费者郁闷至极。本来消协是消费者的娘家,娘家出这种事,等于和婆家联合起来欺负自己的闺女,消费者群体就成了小媳妇儿,活得更难了,娘家助纣为虐比没娘家还惨!

这种事儿折射出来的是社会标准的丧失。没有了标准,社会就没有了参照系,麻烦了。有些标准没了,假了或乱了,整个标准体系也就乱了,失范了;博士,在人心里头没有了;

现在一些教授带博士,一带十几个,和放羊差不多了。一个人怎么能同时琢磨十几个课题呢?别说大脑不够用,就加上小脑也不够用呀;院士,中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现在竟也有贿选的,弄得几位老科学家呼吁取消院士制度。如果科学界的标准乱了,所谓科学的态度,科学的论证,又从何而来?

药监局,一年审批药品上万,平均一天三十个新药出来,据钟南山院士说他都闹不清楚这些药是干什么,真不知道是怎么审的。后来果然东窗事发,抓了人。药者,民族病系,如果病从口入,是因为药闹的,那……

CPI,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没把房地产算进去,据说房地产投资,天知道有多高比例的中国人买房是为了投资?基尼系数,本来是衡量社会财富分配程度的经济指标,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说基尼系数不代表什么,犯不上大惊小怪。可究竟两极分化悬殊不悬殊,或者物价高不高,不光经济学家知道,哪个提菜篮子的小百姓心里没数呢?

天地有衡,这个“衡”小看得,这是标准。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最先统一的就是度量衡,货币、重量、长度的标准,车子的标准,文字改为秦篆,这就是所谓的“书同文、车同轨、水同源”。

没有标准了,就乱了,像《天下无贼》的黎叔说的,“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呀”。没有标准,老百姓就无所依从。

另一方面,乱七八糟的标准出来了,比如某牙膏做了好几年广告,动不动“全国牙防组”认证,“全国牙防组”是个什么机构呢?某医药广告提到“中国科学院院士”。恕我孤陋寡闻,中国科学院在北京,还有个所谓“中央研究院”在中国台湾省,“中央科学院”却是闻所未闻。

标准乱了,背后是人心浮躁。香港某皮包科学院居然给中国的一些院士授予“管理科学院院士”的头衔,后来有人说是被骗了,实在是“拿不是当理说”,说句诛心的话,如果尊贵是研究管理科学的,能不知道那个皮包科学院是什么玩意儿?如果不是研究管理科学的,尊贵好意思接受管理科学院院士头衔?

社会标准乱了,国家权威就受到侵害,李鬼多了,李逵就贬值了,这和劣币驱逐良币差不多。标准乱了,无所适从的是老百姓,贬值的是国家信用。

为天地立心,这个心是什么?就是标准,是社会向前行驶的舵轮。标准要靠法制来保障,也要靠执法者的清正来保障,因为要防止由钞票来制定标准。

想,都是他所能控制,经他挑选后所给予你的,简言之,你被他导向。

第四,他会让你随时刻都感到,除了顺从他,听他摆布,任他宰割,你无处可藏,无路可逃。

这四个条件一旦具备,就形成了一个框架,你一旦置身其中,就会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很显然,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必有一个制造者。这个制造者可以是锁关西牛二,也可是一个两个绑匪,当然也可是一个团伙或一个组织,甚至是一架国家机器。同样,作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罹患患者,可以是一个两个人,也可是一群人、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乃至整个国家。

众口铄金。想当年,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里,每隔几年就必须斗一次;于是,夫妻反目,父子为敌,母女成仇,师生操戈,童叟相欺,老幼互恶,妇孺陌路,同事揭批,邻里告发,上下争竟,忽东忽西……于是,千百万人上亿人几亿人就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更可怕也更可悲的是由此孽

生出来的一种无悔论和母子论——正是在这种天子父母官文化的历史必然性名义下,一次次忤逆人性的迫害大屠杀大清洗,一桩桩骇人听闻的罪行和暴力,一幕幕肮脏阴暗的交易和欺骗,一场场流血的与电火的洗礼,一出出倒行逆施的指鹿为马和黑色闹剧,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周而复始,从而,一天天病人膏肓的冷漠和麻木,最终使方正道德和良知价值在国人心中根本地丧失了地位。

如今,公开的普遍的红色恐怖消褪了,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之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公开的制造者以及普遍的患者也不多了,但这病症并不那么好医治。一则因为此症的隐蔽制造者和局部患者还不少,二则因为心道的传统还在;且两者又都往往处在关键位置,故极易导致局中人反复的创伤,反复的患病,如此一代一代又一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很难康复。

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有这个意思。

我们应从“央企红利”这一切入点开始,认真对待随之而来的一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我们应从“央企红利”这一切入点开始,认真对待随之而来的一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我们应从“央企红利”这一切入点开始,认真对待随之而来的一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